

藏化与回归——云南迪庆“藏回”的文化走向

李志农, 李红春, 李欣

摘要:自元、明至清, 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 云南藏区的回族逐渐适应了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 强势的藏文化逐渐融入其原有文化中, 这些藏区回族在吸纳藏文化的过程中, 也奠定了藏-回两个民族和谐、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从文化变迁理论来看, 文化是族际边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超越族际边界羁绊的一种动力, 不同族群的文化变迁与族群的变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云南藏区回族(藏回)的文化特征表现为藏族和回族文化的亚文化, 其群体也形成了一个亚族群。

关键词:“藏回”; 文化变迁; 藏化; 回归

一、藏回的分布和历史记忆

云南“藏回”主要聚居在迪庆藏族自治州, 据2002年人口统计, 迪庆藏区共有回族1276人, 占人口总数的0.41%, 主要居住在香格里拉县的建塘镇、三坝乡, 德钦县升平镇, 维西县的保和镇和白济乡等地也有回族分布, 其中三坝乡的回族最多。云南迪庆藏区回族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在文化和生活中所表征的民族特征上更多地借用藏族文化, 并形成了一套与迪庆藏区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互动的生态文化体系, 这些在外表上与当地藏族已没有显著区别的回族被当地群众称为“藏回”或“古格”(藏语, 意为“戴白帽的人”)。

但在文化核心上, 部分藏回已完全丧失了回族传统文化核心的宗教特征, 改教信仰藏传佛教, 其民族认同逐渐变更为藏族; 另一部分则通过文化的协调与调适, 兼容并蓄藏等多民族文化的同时俨然保留回族文化特质, 进而形成了有别于回族传统文化的亚族群、亚文化(subgroup/subculture), 然而在民族认同现实中存在差异的是部分既认同自己是回族, 也认同自己是藏族, 在宗教信仰上也表现出重叠性, 既信仰伊斯兰教又信仰藏传佛教; 部分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 他们希望重建起已丧失的回族传统文化, 在今天表现为对回族及信仰伊斯兰教的强烈回归。

迪庆回族为适应所处的生态环境而进行的文化调适, 使得他们或完全同化到藏族中, 或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亚回族族群文化特征, 从而向两种截然不同的纬度发展。但就其结果而言, 它与云南藏区其他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一道, 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族大规模进入迪庆并定居下来大约在清雍正、乾隆年间。这一时期进入迪庆的回族主要聚居在今香格里拉县中心镇北门街, 并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

居住在维西县的回族据传进入迪庆的历史要早于中甸的回族, 并与德钦县开办矿业相关联。清雍正年间(1725~1735年), 发现了升平镇的马鹿场银矿, 大批来自山西、陕西(他们大多自称来自的一个叫烧鸡洼的地方)的回族进入这一地区开发银矿, 并定居下来。

另一支进入中甸的回民来自杜文秀起义军的余部, 大约在1874年前后, 杜文秀起义队伍曾两次来到中甸, 受到当地藏族的欢迎。

近代以来, 进入迪庆高原并定居下来的回族因居住地的不同逐步演变为今天迪庆藏区几大主要“藏回”族群: 香格里拉县建塘镇乌吕村和旺池卡村的回族族群, 香格里拉县三坝纳西族乡的安南村(上村、水磨房村)和哈巴村回族族群(哈巴雪山下的龙旺边村和兰家村), 德钦县升平镇回族族群。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云南藏区族际关系与构建和谐社会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07CMZ003)

作者简介: 李志农,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云南昆明, 650091); 李红春,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云南昆明, 650031); 李欣, 云南民族大学讲师(云南昆明, 650031)。

二、从三个村落来追溯“藏回” 族群的源与流

尽管云南迪庆藏区的回族都有着相同族源及共同历史记忆,而在历史上有着近乎相同的文化特质,也被外界一致认知为“藏回”。然而在历史岁月的冲刷中,在不同时空的互递过程里,“藏回”的文化内容逐渐拉大了差异的距离。尽管在民族认同上大部分“藏回”仍认同自己是回族,但在民族语言、民族服饰、风俗习惯甚至宗教信仰上形成了有别于回族主体文化群体的亚文化特征。

(一) 消逝、记忆、同化——旺池卡村

香格里拉县中心镇的旺池卡村,原本是一个回族人家较多的村,但随着时间推移,今天全村除一位80多岁的马姓老年妇女还保留着对伊斯兰教的宗教认同和不食猪肉的禁忌外,其余原先的回族人家都彻底藏化。今天我们看到旺村已经与藏族村落别无二致,藏式碉楼、火塘、水缸、藏传佛教特征的佛像、活佛画像、村民服饰、方言、饮食、风俗、宗教等都完全藏化。笔者如若不是报告人的介绍很难推断旺村原先为回族村。据报告人和马奶奶的交谈,笔者了解到,能够证明旺村曾经有部分人家是回族的证据,就是藏式碉楼房顶没有插经幡,没有插经幡的大部分人家为回族。藏族全民信仰藏传佛教,每家屋顶必插有经幡以此祈求平安。的确,笔者看到,在旺村有许多人家屋顶不插经幡,可见这一说法应该可信。旺村曾经是个回族聚集的村落,虽然在历史岁月中吸纳了许多藏族的文化、语言、服饰、习俗,但是宗教还是保留伊斯兰教信仰,马奶奶的丈夫曾经就是村中的阿訇。在经历了历史上无数次的民族迫害及“文革”期间极左思想的影响下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挫折后,“藏回”从文化外貌特征向民族认同的内质蜕变,其中回族与藏族的通婚是至为关键的一环,正是在与藏族通婚日益频繁的作用下,“藏回”这一过多表征为文化解释的族群发生了民族心理、血缘、认同的质变和新构。“藏回”成为了历史,成为村民追溯祖源的一种记忆。旺池卡村藏化的体现了“藏回”对藏区经济、文化、环境的一种适应方式。

(二) 十字路——安南村

安南村“藏回”文化时期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急剧时刻。安南村下有水磨房和上村两个村子,两村都是藏族占多数的村子,其中水磨房村有35户藏族,有15户是回族;上村有45户藏族,有2户回族。从户数比例上回族与藏族的比例是1:4.7,回族夹杂居住在藏族中间,从房

屋外观上没有任何的区别,几乎没有两家回族房屋是连在一起的,并且十分分散,这样与其他的回族村是不同的,没有形成小范围内的回族聚居。正是因为这样,安南村回族受到藏族的逐渐同化,风俗上和藏族十分接近。水磨房村报告人马罗兴(曾任三坝中心完小校长)讲到安南回族建村历史已有100余年,历史上回族人数一直比藏族少,但是在以前回族要比现在多得多,由于回族的日常生活与藏族十分密切,所以回族渐渐地被同化为藏族,回族越来越少了。马老师还介绍到现在村中的回族和藏族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回族中80%的人能够很熟练地和藏族对话,日常生活中自己也是习惯讲藏语,每家回族都有许多的亲戚是藏族,在平常的生活中回族和藏族相互帮助往来,关系十分密切和融洽。

在安南我们仿佛看到了旺池卡村“藏回”的过去,安南“藏回”文化特征极为明显,几乎生活、生产、心理都认同藏族,仅保留对回族身份和不食猪肉这样的回族特征的认同。兼有藏和回两个民族的文化特征的文化结构是不均衡的,也是不能够互动和整合的。在安南“藏回”的生活中对回族的文化和心理认同日渐模糊和不知,他们往往较容易接近藏族,尤其大量的通藏族通婚,几乎每家回族成员中都有藏族。民族边界维护最牢固的民族心理素质一旦被跨越,那么民族认同很容易根本被颠覆。笔者调查了解到,安南“藏回”往往表现出没有过于强烈的回族自尊心和归属感,所以在今天很多的中青年都名义上保留了回族的身份,但却饮食上没有回族传统的禁忌。一部分上学、工作的“藏回”处于政治经济利益考虑往往将民族变更为藏族,因为拥有藏族的身份能够上学有民族照顾,政府部门工作也往往容易晋升。与旺池卡村“藏回”一样,安南“藏回”由于与外界回族长期失去联系,回族文化不断遗失,而倾向于对藏族文化大量快速借用的事实,按此趋势推断同化为藏族亦是安南“藏回”的未来。安南“藏回”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变迁呈现出对藏文化的另一适应方式。

(三) 回归——哈巴村

从文化层面而言,能够将藏和回两种文化有机融合在生产、生活场景中,并能够对两种文化产生出对应的认同,外界比较容易能够觉察到既有藏族文化特征又有回族文化内涵,真正表现为“藏回”特征仅在哈巴村能够看到。

1. 文化结构。哈巴“藏回”从事农、牧、商三业并举的生产方式。在农业方面,迪庆高原的主要农作物有玉米、青稞、小麦、马铃薯、大

麦、荞麦、蔓菁等。在畜牧业方面，饲养的牲畜主要有牦牛、犏牛、黄牛、马、山羊、绵羊、骡子等。在商业贸易方面，回族“无回不商，无回不活”的文化传统得到传承，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外出打工或做生意。他们把迪庆高原的特产如酥油、药材、松茸、羊肚菌、羊毛地毯、木碗运到外地贩卖，又把内地生活日用品、生产资料等运到藏区出售。在生活方式方面，哈巴“藏回”与当地藏族并没有太多的差别。在住房上，居住于坪坝的多住碉式房屋，居住于山区的多住木楞房，一般为正房两间，一间为伙房，一间为卧室，为适应高原冬季寒冷、夏季多雨、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特点，其正房正中内均置有火塘，通常彻夜不熄，用以做饭、煮茶、取暖等，而在火塘四周铺床而寝。在日常饮食上，除忌食猪肉外，与当地藏族一样，以青稞、小麦为主粮，喜食糌粑、面食，通常一日三餐都喝酥油茶、吃酸奶渣、奶渣豆腐等，在节日期间和藏族一样做“息鲁息罗”、“梯哄”、“叭碴”、米糕等食品；在服饰上，年轻人平时喜穿时装，年老一些的“藏回”男子平时喜欢穿藏袍，戴毡帽，挂藏刀，一些老年女性均穿戴藏式长衫外加花边坎肩，首饰也都由白银打造，镶以绿松石、珊瑚等；在姓氏上，迪庆“藏回”都有藏名和汉名，老辈藏回还有请阿訇取经名。

在20世纪80年代，“中甸回族基本上说藏话，不懂或不通汉语。三坝区安南回族因为从县城藏族聚集地方迁来，加之与藏族杂居，所以能够讲流利的藏语和汉语，引人注意的是安南回族内部的日常交流用语依旧是藏语。而兰家村和龙湾边回族平时讲汉语，藏语的熟练程度随年龄而不断减弱，老年还会一般对话，中年只知道部分藏语词汇，年青人逐渐完全不懂藏语。其中哈巴回族由于居住地有纳西族和彝族，因而在交往中，他们也学会了一些纳西话和彝语，往往是汉语中夹杂着不少藏话、纳西话和彝话。德钦回族基本上讲藏话，但也懂汉语。”20多年过去了，在迪庆“藏回”族群中双语或多语现象并没有太大的改变，除年轻人会讲汉语的比例增加外，往往仍然是汉语中夹杂着藏语或藏语中夹杂着汉语，特别是一些日常生活用语则完全袭用藏语，诸如他们把打酥油的木桶叫“苏拉”、水瓢叫“桑桶”，冲牛奶的桶叫“武当”，把火塘叫“托卡”，公牛叫“组”，母牛叫“格”等等。在三坝纳西乡哈巴村的龙湾边和兰家村两个自然村的“藏回”，由于在迪庆藏区中甸中心镇和三

坝乡的安南村等藏族聚居区中生活了有150多年，其语言已基本藏化，在大约80多年前从安南村迁入纳西族、彝族、藏族聚居地哈巴雪山下的兰家村和龙湾边定居下来后，其使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比例才开始逐步下降，在我们最近的一次对村中老人语言使用的调查中发现，其藏语仍然占日常用语的45%以上（仅限使用者），在年轻人中几乎使用汉语，藏语使用在生活日常物品的名称指代，也包括部分纳西语和彝语。另外，由于哈巴村的“藏回”其祖先大部分来自陕西和山西，因此在语言中仍使用着有别于云南汉族的陕西和山西汉语方言，如太阳叫“热头”，把馒头叫“馍馍”，麦饼叫“锅盔”，菜牛叫“占牛”，把通婚叫“开亲”，把我们叫“俺们”等等，这些方言在云南其他回族内部都没有，而与陕西方言则极为吻合。

在20世纪80年代，“在整个藏区的广大回族群众无论老少都知道自己是回族，不吃猪肉，信仰伊斯兰教，但对伊斯兰教教规和教义都不懂了，只有个别的回族反映了信仰上的双重性。”但是，在最近的多次调查中我们发现这一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哈巴村的龙湾边村和兰家村在云南沙甸和纳家营回族的帮助下走上了伊斯兰文化复兴的道路外，在迪庆藏区大部分至今还自称为回族的回民的人群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本民族宗教意识衰退和宗教文化双重性的特点。如在德钦德钦县升平镇的36户170多人的回族中，只有10多户信仰伊斯兰教，而经常去清真寺礼拜的只有3人。而在相当一部分没有改教的回族族群中，大部分都是既信仰伊斯兰教也信仰藏传佛教，甚至出现了在一个家庭中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局面。德钦县升平镇的大部分回族，既与其它藏族一样到初一、十五到喇嘛庙里煨桑磕头，参加活佛摩顶，也在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到太子雪山朝圣祭山，清早煨桑、烧香祈平安。而在每家每户都贴有红色纸条幅，上书“主圣护佑”（主-真主、圣-穆罕默德护佑）；另一方面家中摆有佛像、班禅画像、菩萨塑像等。有些做金银器的回族，在柜台正中供有藏传佛教菩萨，右边供金匠的祖师像，左边同时挂有“主圣护佑”条幅，三边都是香火缭绕，酥油灯光影闪烁。这样的日常生活场景在哈巴、安南等藏回村落里也能够看到，其中除哈巴村于2000年的伊斯兰教宣教工作后废弃了其他宗教生活，其他的回族村落至今仍是多元宗教信仰混杂的状

马维良，王运芳：《迪庆藏族自治州回族调查》，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

马维良，王运芳：《迪庆藏族自治州回族调查》，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

况。“藏回”精神生活中表现出不同宗教并存的事实，主要因为其族群对自身民族传统宗教文化和他族宗教文化的模糊认知，仅仅出于实际生活需求的实用主义考虑（如遇久治不愈的病症）及受婚姻（族外婚）的影响而发生了在“藏回”生活空间里多元宗教的和谐并存。

2. 变迁、回归和返观。居住在三坝乡哈巴村的回族族群，由于受到文化复兴的影响和来自其他地区回族的帮助，自2000年以来，原本回族意识几乎处于消失殆尽的哈巴村“藏回”出现了伊斯兰文化复兴的浪潮，在宗教上表现出了较为完整的伊斯兰教文化特征，男子戴白帽、妇女身着藏服头戴盖头，婚礼、葬礼仪式严格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办理，村民们力行宗教功修，但是在语言、饮食、生产方式、妇女服饰等方面仍旧不同程度保留藏文化特征，说明“藏回”族群文化特征已经结构化，多元民族文化的共存并不以传统民族文化的重建而发生颠覆。也证明了族群文化变迁和族群认同之间的差异是可以弥合的，这需要的是文化多元主义（pluralism）的理性理解。

然而，从哈巴村“藏回”集体回归传统回族的宗教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并引致了村寨族群内部和族际之间关系的不和谐因素的萌发。这不由得我们对回归现象进行返观，重新去剖析这一现象的本质。今天，哈巴“藏回”一方面极力要求恢复传统回族文化，加强回族认同，与外界回族、穆斯林加强了联系和交往，大兴宗教宣传和学习，将伊斯兰教教义运用到具体的族群日常生活、习俗之中。但是，另一方面对原有已经结构化了了的“藏式”生活文化习俗产生眷恋，而不原意舍弃，如老年妇女早已习惯穿藏族的长袍，因为这样的服装偏利于高原气候下的生产和生活，还有饲养牦牛、犏牛等，以酥油茶为主食也是很难改变的。在外界回族同胞热心帮助恢复伊斯兰教信仰，并在人力物力大量资助的过程中，产生出对“藏回”一种不平衡的关系，笔者将其称为“大哥意识”。具体是指，一些来宣教或进行经济扶贫的回族群众要求哈巴“藏回”在服饰、交际方式、节庆等诸多方面变更为大众视野中的回族特征，要求禁止穿藏服、鼓励经商（抛弃养牛）、禁止过非回族的传统节日（如新年、端午节、中秋节），禁止藏歌藏舞娱乐。严格来讲按照伊斯兰教教义

“藏回”的这些生活习俗并没有与之存在根本的冲突，“大哥意识”要求“藏回”建立的是传统回族—伊斯兰式的社会，而藏回—伊斯兰式的社会受到否定和不宽容。这样对于长期缺乏回族文化的“藏回”族群而言，回归多为不愿完全像旺池卡、安南“藏回”一样被藏化，回归回族文化本来就是激情式的参与，而意识上并没有强烈的认同，在这些压力的冲击下使得族群普遍产生回归意识逐渐淡化的反应。此外，突出表现在婚礼和葬礼的风俗变更上，哈巴“藏回”与安南“藏回”亲友及外族亲友因为风俗的差异而产生彼此之间关系的鸿沟。原先哈巴“藏回”结婚与藏族一样都有泼水祝福、喝酒、唱藏歌、跳藏舞等仪式，而葬礼则有戴孝发送亲友孝布的习俗，而在回归后，这些风俗都一一被取消，安南和外族亲友从而产生反感，没有了原先的那些仪式风俗他们觉得“没有参加”到其中，逐渐也就不来参加哈巴“藏回”的婚礼和丧礼了。这些新的社会问题困扰着哈巴“藏回”，如何整合文化变迁和族群认同的关系是其族群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

三、结 语

从史料回望，云南藏区回族可追溯到元代，然而，真正形成“藏回”这一特殊文化群体则仅有100余年的历史。云南“藏回”人口稀少，分部广泛，受地理环境影响藏化程度也各不相同，在今天民族意识高涨的浪潮下，不同的“藏回”族群对现代性的应对呈现出复杂的方式和过程。族群文化变迁和族群认同也随之显现各自的表述形式，是藏化，是回归，还是“第三条道路”（藏化和回归的整合），此类抉择同样置于边陲一隅的“藏回”面前，更加复杂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变迁相互交织在一起，传统与现代的取舍又一次向我们进行拷问。文化作为族群性、认同、历史的重要表述，在文化的城隅里构建起的族群文化和认同往往不囿于文化类型的羁绊，通常相同形式的文化内容上升为代表不同族群认同的现象比比皆是，由此可知文化在实际的族际交往中既充当“他文化”的标签，又扮演跨越族际边界的信使角色。

（责任编辑 何斯强）